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 编

特稿

重建华夷语系的理论和证据(上)

何九盈

民俗学

《大唐西域记》的民俗学研究:佛典文献与口头故事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分析

董晓萍
史玲玲

文献学

元代南人献赋本事考

黄二宁

文字学

《说文解字》与中国传统人文科学

[法国]蒲芳莎 [挪威]何莫邪, 李国强 蒲芳莎(译)

《大正藏》疑难字考释(三)

李国英

金文所见“邾”、“甬”等字及相关问题探讨

罗卫东

秦文字“徒淫”的释读及其相关问题

王 伟

训诂学、词汇学

汉语词汇系统发展中的语素类化

卜师霞 凌丽君

《礼记》用器类名物词“异名同实”现象研究

刘兴均

黄梅方言中的“妈妈”和“老板”

卢烈红

“卮言”本义词源学考释

于雪棠

——兼及《庄子》的言说方式与文体形态

论“儒”的训释与儒家的历史特点

孟 琢

——兼论训诂学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音韵学

关于仙岩书院藏板《礼部韵略》

[韩]俞昌均, [韩]曲晓云(译), 张民权(审订)

小议C本八思巴字《百家姓》“缪”姓的拼写

陈鑫海

博士生论坛

江声转注说探源

王相帅

明代“海篇类”直音系字书研究

郭敬燕

从故事形态学到故事学

邓 苗

——普罗普故事学理论的意义、困境与出路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十四辑



商務印書館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十四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4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
文字研究中心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10936-9

I. ①民… II. ①北…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
②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K892②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71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ÍNSÚ DIǎNJÍ WÉNZÌ YANJIŪ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十四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936-9

2014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½

定价: 45.00 元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董 琨

委 员(音序排列)：

安平秋 郭锡良 何九盈 黄天树 江蓝生 李 强

刘魁立 鲁国尧 王邦维 张 博 赵 诚

主 编：王 宁

副主编：董晓萍

编 务：黄易青

目 录

● 特稿

- 重建华夷语系的理论和证据(上) 何九盈 1

● 民俗学

- 《大唐西域记》的民俗学研究:佛典文献与口头故事 董晓萍 44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分析 史玲玲 66

● 文献学

- 元代南人献赋本事考 黄二宁 79

● 文字学

- 《说文解字》与中国传统人文科学
..... [法国]蒲芳莎 [挪威]何莫邪,李国强 蒲芳莎(译) 95
《大正藏》疑难字考释(三) 李国英 112
金文所见“邾”、“鼃”等字及相关问题探讨 罗卫东 124
秦文字“徒淫”的释读及其相关问题 王 伟 132

● 训诂学、词汇学

- 汉语词汇系统发展中的语素类化 卜师霞 凌丽君 139
《礼记》用器类名物词“同名异实”现象研究 刘兴均 149
黄梅方言中的“妈妈”和“老板” 卢烈红 171
“卮言”本义词源学考释
——兼及《庄子》的言说方式与文体形态 于雪棠 180
论“儒”的训释与儒家的历史特点
——兼论训诂学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孟 琢 185

● 音韵学

关于仙岩书院藏板《礼部韵略》

..... [韩]俞昌均,[韩]曲晓云(译),张民权(审订) 193

小议 C 本八思巴字《百家姓》“缪”姓的拼写 陈鑫海 205

● 博士生论坛

江声转注说探源..... 王相帅 208

明代“海篇类”直音系字书研究 郭敬燕 215

从故事形态学到故事学

——普罗普故事学理论的意义、困境与出路 邓 苗 226

英文提要 234

(本辑所有文章均经两名以上同行专家审稿)

重建华夷语系的理论和证据(上)*

何九盈

提要： 汉语和亲属语言关系的研究，由于一直模仿印欧语系的研究方法，可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本文提出“重建华夷语系”，就是要另辟新的路径，做新的尝试。

“华”、“夷”只是文化的不同，语言的不同，并非种族上的差别。“夷”乃中性词，毫无贬义。华夷原本是一家，分“家”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大分工的结果。有人进入了农耕社会，有人还停留在游牧或农牧阶段，于是土地就成了争夺对象，争夺的最高形式是：战争。战争导致了部落联盟的产生，导致了部落的不断重组，于是有了不同的语族。有的语言消失了，有的语言扩张了。语言的命运也就是族群的命运。战争造就了“华夷语系”，造就了四大语族，即羌戎语族、百越语族、苗蛮语族、华夏语族。五帝时代，这一格局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东夷语和北狄语呢？东夷语在五帝时代前期就已经分化，有的华夏化，更多的是演变为百越语族。本文以语系为根据，首次区分“内北狄”与“外北狄”。以华夷语系为母语的属于“内北狄”，以阿尔泰语系为母语的属于“外北狄”。内北狄在战国时期已全部华夏化，故不能与四大语族并列。

本文用口传历史、亲属语言、考古文化三证合一的方法证明四大语族的亲属关系。考古文化的辉煌成就改变了我们的语言视野和文化观念，尤其是意义空前重大的红山文化的发现，对激活古老的口传历史、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保存在古汉语中的原始华夷语留下来的某些化石词，经与亲属语言互相印证，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疑不能明的历史信息。破译化石词是史前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

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一次革命，“华夷语系”这个新概念就是革命的产物。

西哲黑格尔有言：“密纳发(Minerva)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是时候了，该中国史前语言研究起飞了！

关键词： 华夷语系 四大语族 五帝时代 杂种

壹 总论：何谓华夷语系

“华夷语系”，作为一个独创的学术概念，并不是人为的主观的规定，它是中华语言

* 本文从录入到刊发，得到王宁、黄易青、曹坚三位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自然而然形成的。古人当然不可能有“华夷语系”这样的语言概念,而对华夷诸集团的区分是很清楚的。

《淮南子·齐俗训》说:“三苗𪔐(zhuā)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𪔐(jiǎn)发。其于服一也。”

这是西汉时期认定的中华大地上的四大集团。“三苗”即苗蛮集团,“羌人”即羌戎集团,“中国”指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越人”即百越集团。

这里没有“东夷”,因为东夷集团在五帝时期已经分化了;也没有“北狄”,北狄语族在战国时期已消失了(关于北狄语族的消失问题,下文将有详细论述)。

本文所提出的“华夷语系”,包括四大语族,即苗蛮语族、百越语族、羌戎语族、华夏语族,与《淮南子·齐俗训》的分类是一致的。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三苗”、“羌人”、“中国”、“越人”之类的名称,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们并不是同一个时代产生的。在旧石器时代,部落繁多,语言繁多,没有相应的族群,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语族。语系、语族得以产生的原因很多,而战争是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把他们分成了不同的集团,又是战争使这些集团不断瓦解,不断重组,不断扩大,最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了《淮南子·齐俗训》说的四大集团。

四大集团中实力最强大的为黄帝集团。据说“黄帝五十二战”^{〔1〕}。《史记·五帝本纪》也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在五十多次战争中,其中有三大战役最为重要。第一大战役“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2〕},“轩辕战涿鹿,杀两昊(一作“皞”)、蚩尤而为帝”。(《盐铁论·结和》)“杀两昊”为第二大战役,杀蚩尤为第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奠定了四大语族的基础。

黄帝伐炎帝的结果,炎黄二集团分裂。羌戎族就是以炎帝部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华夏族就是以黄帝部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黄帝杀二昊的结果,是黄帝集团占领了东夷地区。二昊集团大分化,有的演化为华夏族,有的向东南逃遁,演化为百越族群。

黄帝杀蚩尤的结果,是蚩尤部落南逃,演变为三苗集团。直到舜禹之时三苗集团仍很强大。

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始于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各游群组织,在广袤的大地上,随意东游西荡,向大自然索取生存资料,与草木鸟兽打交道,没有理由也没有条件发动

〔1〕《隋书·炀帝纪下》,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三征高丽诏》,中华书局,1973年。又,《太平御览》卷79引《帝王世纪》作“凡五十五战而天下大服”。(本文所引《隋书》、《汉书》、《后汉书》、《宋书》均系中华书局出版,以下出版单位不重复出注。)

〔2〕《史记·五帝本纪》,第3页,中华书局,1959年。(以下出版单位不重复出注。)

战争。新石器时代不同了,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了,为土地,为水利,为盐业,为劳力,为争夺统治权,都可以发动战争。

春秋时期,楚国的风胡子将战争的发展依兵器的性质不同而划分为四个阶段。“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指春秋时期),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

“以石为兵”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前期,战争的主体为轩辕、神农、赫胥三大古老集团。轩辕即后来的黄帝集团,“以玉为兵”的“黄帝”不能理解为轩辕以外的另一个集团,这个“黄帝”是轩辕集团发展过程中最杰出的一个代表人物,对“玉”的崇拜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色;神农即后来的炎帝;赫胥集团是伏羲的母系氏族,口传历史中称之为“二昊”的氏族与赫胥氏有血缘关系;禹属于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末期与国家组织、世袭制度开始形成的初期。至于“铁兵”,则已经完全脱离原始社会而是往后数千年间王权战争、民族战争的常规形式了。前三个阶段都属于新石器时期。

战争与语言的关系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使“语系”、“语族”得以形成,二是改变原始语言的自在状态用武力划定新的语言地缘界线。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华大地上,民族之多、语言数量之多,今人已无从确知,若说数以万计,肯定不算夸张。而“以石为兵”只列举了轩辕、神农、赫胥这三大集团,是因为这几个集团在战争中胜出,人多势众,雄踞一方。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已由血缘小范围扩展到地缘大范围。正是这三大集团奠定了原始华夷语系的根基。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语言地缘界线大致上已经明确,也就是四大语族已基本形成。冀州(指《禹贡》中所说的冀州)是华夏语的发祥地,青甘高原是羌戎语的生成地,荆州两湖地区是苗蛮语的形成地,东部沿海地区是百越语的中心地。但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后,地缘对三大夷语族还只有相对的意义,外压和内斗的矛盾促使他们不断迁徙转移。潘光旦在1963年的日记中就多次谈到百越族的迁移、分布情况。

五月十六日

摘录《竹书纪年》资料片约20张,于百越从东海岸向南海岸移动一事,自觉有所发现。^{〔3〕}

五月二十日

东北有百越之迹,似愈看愈不太隐约,与山东半岛可以比拟,两地海路,自必远古即已相通也。^{〔4〕}

〔3〕 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附录》,第48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4〕 同上书,第484页。

十二月十九日

百越族之分布,远古亦曾至东北及朝鲜,有迹象可资推测,山东河济间更不待论。^{〔5〕}

羌戎族、苗蛮族也无法避免长期迁移的命运,现在西南地区尤其是云贵高原聚集了众多的少数民族,有的属于土生土长,但多数是由东由西迁移过来的。

以上两点决定了“华夷语系”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所谓“特定的历史”是指它的形成期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传说时代,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离开新石器时代,“语系”、“语族”就失去了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即使有非常精致的语音对比、构拟,也是没有历史支柱的空中楼阁。完全撇弃口传历史,“语系”、“语族”就只有一堆用于对比的语言资料,而看不到使用该语言的历史主人。

重建华夷语系的基础工作就是要请出该语系、该语族的历史主人。由历史主人进而确定语系内部的不同层次。如黄帝、炎帝两大氏族原本为兄弟,故华夏语、羌戎语关系最为密切,尽管前者属华,后者属夷。苗蛮语族的形成又与前二者不同,属于另一个层次,它的历史主人由三苗上溯到九黎再上溯到蚩尤再上溯到炎帝神农氏,还要加上“别三苗于三危”,所以从历史渊源而言,它和羌戎语族的关系更亲于与华夏语族的关系。百越语族的历史主人原本是与炎黄二族并列、其文化贡献、历史影响又先于炎黄二族的“二皞”伏羲氏族群。由于黄帝杀二皞,他们成了被征服者,他们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被黄帝族语言渗透,再加上祝融族及夏禹后裔的介入,他们也成了华夷语系的一员。

语系、语族的历史主人,也是左右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人。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四大语族的主人经历了一个加减乘除的演变过程。他们的族群之内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紧跟农业社会步伐前进的变成了“华”,停滞不前或发展极其缓慢的氏族、部落则成为“夷”。公元前8世纪周太史伯对司徒桓公友说:“姜、嬴、荆鬻,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炎帝后裔;嬴,少昊后裔;荆鬻,祝融后裔;诸姬,黄帝后裔。将这条材料与前引《淮南子·齐俗训》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羌人与姜,都是炎帝之后;越人与嬴,都是少昊之后;三苗与荆鬻、祝融比较特殊,荆鬻为祝融之后,而三苗并非祝融之后,不过,徐旭生说:“(祝融)虽出于另外的集团,但是由于他到苗蛮集团做首领,苗蛮自然受他的影响,而他及他的后人的风俗习惯大部分也要同化于苗蛮,也是一种不可免的情形。”^{〔6〕}中国与诸姬不能画等号,因为《淮南子》时代的“中国”,不仅包括了“诸姬”,就是600年前桓公友说的姜、嬴、荆鬻等方国也全是“中国”人了,也就是都属于华夏语了。

这样一对比,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义的事实:华夏语内部的方言(也可以视为语支)

〔5〕 潘光旦《中国民族史料汇编·附录》,第486页。

〔6〕 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第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与华夷语系的语族有对应关系。

荆蛮语(后来的楚方言)对应苗蛮语族

嬴语(后来的吴越方言)对应百越语族

姜语(后来的秦陇方言)对应羌戎语族

诸姬语(后来的中原雅言)对应华夏语族

二者可以对应的原因就是同一族群有的在华,有的在夷。如在华的羌人操姜语,在夷的羌人仍保持原有的羌戎语。在发展过程中双方都会朝不同的方向演变,姜语会向华夏语靠拢,羌戎语也会在迁移中受周围其他族群的影响。

这里要注意一种矛盾现象,即封君的语言与受封领地的语言不一致。如嬴秦的祖先原本属于东土徐地,而封地却在西土,属于羌戎语族。这些少数统治者受羌戎语的包围,不能不放弃原来的徐州语言,彻底西化。如战国末期,秦昭王之母宣太后,本楚人,姓芈氏^{〔7〕}。西羌的义渠王朝秦与之私通,生二子^{〔8〕}。私通是不能带翻译的,这说明义渠王所操的羌语与秦地的姜语虽已很不相同,但互相迁就是可以对话的。

封君的语言与受封领地的语言有矛盾,有融合,也可以证明种族不等于语族。同一种族可以操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也可以操同一语言。这不等于是说,种族和语族毫无关系。一般情况是:种族和语族具有同一性。在重建语系的时候,既要深入研究种族,又不拘泥于种族。

目前,涉及汉语与亲属语言的“语系”学说,可谓林林总总。我们提出重建华夷语系,不是凑热闹,也不是要刻意标新立异。我很坦率地说,这是积累了多年的心愿,也有很明确的针对性。

20世纪80年代,分子生物学家提出了“线粒体夏娃”的理论,用基因数据研究语言的起源和扩散。研究者断言:

华夏56个民族和东亚、东南亚各民族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带有M122的突变。^{〔9〕}

“华夏56个民族”,有的属于印欧语系,如俄罗斯族、塔吉克族;有的属阿尔泰语系,如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能说他们“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吗?在常识上也说不通吧。

还有人断言:“这一切显示人口是逐渐从南而北迁移”,所以“中国的北方人”“他们是南方人的后裔”,“黄帝是传说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统一各部落的共主……但黄帝却是更早几千年前从东南亚迁移北上的现代人的后裔”^{〔10〕}。这类说法彻底颠覆了以往

〔7〕《史记·秦本纪》,第209页。

〔8〕《后汉书·西羌传》,第2874页。

〔9〕《DNA的秘密:北京猿人不是华夏祖先?》,《新京报》2005年5月10日。

〔10〕[美]史蒂夫·奥尔森著,霍达文译《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第122页,三联书店,2006年。

关于语系、语族研究的全部成果,也彻底否定了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史。

然而,基因寻根终究敌不过考古寻根。20世纪80年代考古寻根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口传历史由于得到考古文明的印证,早已被埋没的资料重新显示其应有的价值。对于研究史前语言史的人来说,不应该对基因寻根的语言起源论再保持沉默了,这是提出重建华夷语系的第一个原因。

2014年3月26日,《光明日报》登了一则《关于面向国内外举办“蚩尤像”征稿启事》,对蚩尤与苗族、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有如下断语:

苗族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其先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生活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九黎部落集团,蚩尤为该部落集团最高首领。从流传数千年的苗族传统文化记忆及各种汉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蚩尤既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杰出历史人物之一,又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创始人之一。

这个断语是有文献为据的,细节上可能有分歧,但苗族与华夏族属于同一语系,早已有明确定论。可是,20世纪有一个美国人名叫P·K. 本尼迪克特的写了一本《汉藏语言概论》,经另一个美国人J·A. 马提索夫编定,又经乐赛月、罗美珍两位先生于1984年译为中文。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因为《概论》所建立的汉藏语系不仅排除了壮侗语,也排除了苗瑶语。在2007年的一次“关于藏缅语研究的对话”中,马提索夫仍然坚持:汉语和苗瑶语之间的关系是接触关系,非亲缘关系^[11]。我很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这是我提出重建华夷语系的第二个原因。朱德熙先生提出:“用独立的眼光去研究汉藏语系语言”^[12]，“重建”的“眼光”是否“独立”，至少没有像马提索夫那样奉白保罗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灵感来源和偶像”吧。因为我起码有独立的历史眼光。

李方桂最早将汉藏语系分为四个语族,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概论》继承和发扬了这个四分格局,我个人也很赞同这样的分类。《重建》的分类看似和李氏一样,实则有两点原则性的不同。一是出发点不同,李氏的分类是从当代各族语言的现状着眼,我的分类是从原始时代各族的分合着眼。前者在于描写、对比,后者的目的是语言寻根。由于出发点不同,对语系、语族的命名也随之而别。“汉藏”作为语系名称实有欠缺,“汉”与“藏”是两个族称,它们并不能代替苗瑶、壮侗。我用“华夷”作为语系名称,因为从古以来,凡是与“华”文化、语言、习俗、制度有别的族群,不论中外,全都可以称之为“夷”。“夷”原本无贬义,而且“华”、“夷”可以互变,故中国内部的“华”、“夷”的的确确原本是一家。至于语族名称,我用“华夏”、“羌戎”、“苗蛮”、“百越”,都含有深远的历史感,与寻根的目的正好相应。另外,“汉语”和“华夏语”虽说一脉相承,二者却不能等同;“羌戎”与“藏缅”更不可

[11] 《汉藏语学报》第2期,商务印书馆,2008年。

[12] 见《汉藏语概论·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等同,而“羌戎”的丰富历史内涵以及对国内与之相关族群的全面覆盖,都是比较理想的。

语系、语族研究,原本属于史前语言史的范畴,属于语言寻根性质的研究。基于这一立场,我提出了重建华夷语系,这是第三个原因。

我这样谈问题,完全不是要否认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要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另辟蹊径,给这个领域增添另一道风景。为达此目的,我提出了一种理论预设及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

我的理论预设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华夷原本是一家。

“三证合一”是什么?即口传历史、亲属语言、考古文化,三种证据,互相支撑,互相印证。

三证的交会点,要落实在社会形态、生产技术、文化观念、区域差异、地理特征、原始战争等方面。具体而言,原始的氏族名、部落名、地理名(如山名、河名、行政区划名等)、人名、器物名、神灵名、鸟兽名、草木名,其中往往隐藏着原始时期传下来的重大信息。这类信息就是语言密码,破译这类密码,我们就能意想不到地获取命名者的语言、文化观念以及他们与同时代、同地缘的其他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方法从原则上摒弃那种全景式的根本无法验证的从西方抄袭来的所谓原始语音构拟的方法。我当然不反对构拟学说,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构拟模式能走出自话自说的狭小学术圈,这的确是一大教训。

下文就对理论预设及三种证据分别论述,把我的基本观点说出来。

贰 理论预设:华夷原本是一家

一、何谓“一家”?就是说,“华”与“夷”原本有共同的原始祖先,共同的原始语言,当然也都是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

我国现有的 56 个民族,有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的远裔,也有数千年前就不断从远方迁徙过来的、非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的后裔,他们一直保留自己的语言、习俗、文化特征。这两种后裔,在政治上已属于“一家”,属于不可分割的中华大一统,而从语言系属来分类,前者属于“华夷语系”,后者则非华夷语系。也有语系暂不能定的中间状态。属于华夷语系的有藏语、彝语、景颇语、缅甸语、羌语、侗台语、苗瑶语等,其中包含 29 个民族。属于非华夷语系的语言有俄语、塔吉克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高山族语、京语等,属于暂不能定的中间状态。

二、“华”与“夷”是二元结构,与“一家”的“一”互相矛盾。这种矛盾是如何形成的呢?从原始状态而言,是先有“华”还是先有“夷”呢?是“华”衍生出“夷”还是由“夷”衍

生出“华”呢？

17 世纪的王夫之已经有这样的认识：

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

……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徵之，迨此之盛则彼之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13〕}

依王夫之的看法，黄帝（名曰轩辕）以前的中国，跟“夷狄”一样，处于无文字无礼义的原始状态，太昊以前的中国人跟禽兽一样，处于蒙昧混沌状态，唐、虞、三代之中国人已有别于“夷狄”属于文明礼义的“华”人了。

时代断限正确与否，略而不计，由“夷”衍生出“华”，这是历史事实。征之史实，二昊时代、炎黄时代，“华”、“夷”这样的对立即使已经存在，但“华”、“夷”这样的称谓是不存在的。由人人都是“夷”渐变为有的氏族在衣冠、器物、礼仪等方面高于“夷”、别于“夷”，在意识形态、对天、地、人、神的认识水平方面，文字符号方面、语言精密方面，都出现了文明大进步、大革新，于是号称为“华”或“夏”的氏族、部落，一枝独秀，登上了历史舞台，一直延绵、发展至今。

至于衍生的原因，王夫之当然不得其解。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开头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衍生的契机是农业大革命的出现，农业革命为“华”、“夷”之别设置了分水岭。在北中国，这场革命的发生地以中原地区最为突出，唐、虞、三代在中原地区造就了一个先进的核心文明，成为“华”（夏）族向四方扩散、发展、开拓的重要根据地。

华夏文明以多种形式向四方辐射，于是，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对立就越来越突出。事实是：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四夷的华夏族终归要占上风。孟子总结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以前的数千年文明史，从总体来看就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用夏变夷”史。变的内容很多，而第一等重要的是变夷语为华言。这里所说的夷语很复杂，对华夏族而言，一切要经过翻译甚至是多重翻译才能听得懂的语言都是“夷语”。黄帝时代、夏禹时代都号称有“万国”之多，商汤初期有三千余国，周朝初年还剩下一千二百国。当时所谓的“国”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有的是万国，他们所操的语言不一定与华夏语有大的差别，但差别甚大不能互相交流的“夷语”肯定数量很大，古代的翻译工作者也就产生了。可是，到了战国末期，“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吕氏春秋·慎势篇》）。“方三千里”之内用不着

〔13〕《思问录·外篇》，第73、74页，中华书局，2009年。

翻译,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社会文明进程。正如高诱注文所言:“华夏之盛明”,故“不用象、译、狄鞮也”。

华夏语的发展、壮大过程,也就是“夷语”萎缩、被融化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数百年间,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不知道有多少“夷语”在中华大地上消失了,已经无法考证。

三、农业社会的出现,为华夷划出了最初的分界线,在此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条分界线不断地在改变、在重组。故华夷之分始终具有相对性,不存在恒定不变的绝对性。也就是说,既没有纯粹的华种、华语,也没有万古不变的“夷种”、“夷语”。无论是炎黄子孙,还是二昊子孙,蚩尤子孙,九黎、三苗子孙,祝融八姓后裔,无不有在华者,有在夷者。冯承均曾“得下一公例:‘凡历史种族皆为杂种。’”^{〔14〕}顾颉刚也说:“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15〕}与没有“纯粹血统”的“杂种”相应的就是语言的交融、混合,从而没有一种语言始终保持原始状态“纯”而不“杂”。

为什么人类各族群注定要变为“杂种”呢?原因大抵有三:一是和平演变。为了寻找新的水源、牧场或耕地,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集体大迁徙,建立新的统治区域,与新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成为新的族群。经过千百年的演变,他们的语言已与原来的母语发生种种差异,乃至自成体系。二是因特大自然灾害而发生演变,如尧舜时代的大洪水,氏族、部落、部族、方国发生大转移、大迁徙、大协作、大融合,许多旧的群体在灾难中瓦解、没落,而重新组合起来的新的群体应运而生,华夏族群的发展、壮大,也与洪水的包围、切割有关。“州”这个概念的出现,地理“州”的划分,标志着族群由血缘发展为地缘、由小国寡民发展为大的联合体。“天然人种,动物学方面的人种”早已不复存在,“文化人种”也就是“混合人种、历史人种、社会学方面的人种”登上了历史舞台(冯承均《唐代华化蕃胡考》)。三是战争、流放所造成的演变。这方面的原因最为重要,可以说是“杂种”、语言混合的主要原因。黄帝和蚩尤大战,舜禹对三苗之战以及舜流放“四凶”,都引发了种族、语族的大变动。每次战争,战败一方都面临三种命运,一是被杀,二是被俘,三是被流放。被俘者的语言被同化,被流放者就不一样了。如“四凶”分别流放于东南西北,他们的族群就分别与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相结合,他们的任务是要“变”四夷,在“变”夷的同时自己的语言、文化也不能不变,新的蛮夷之国,新的语言变种也就在“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春秋时周王朝的内史过说:“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

〔14〕《唐代华化蕃胡考》,原载《东方杂志》二十七卷十七期,后收入《冯承均西北史地论集》,第118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

〔15〕《顾颉刚自述》,收入《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第2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国语·周语上》)可证“蛮夷之国”的产生,往往是流放者与土著民共同经营的结果。

所谓“裔土”之“裔”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用后世的边界观念来理解。王夫之说:“《春秋》所书戎狄,皆非塞外荒远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据横亘交午于中国之溪山林谷,迁徙无恒,后世为流民、为山寇,皆是也。泽、潞以东,井陘以南,夹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夹淮之薺,淮夷也;商、雒、浙、邓、房、均,戎蛮陆浑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汉、川、秦、鞏,姜戎也;潜、霍、英、六、光、黄、随、均,群舒也;宣、歙、严、处,岛夷也;其后以郡县围绕,羁縻而附之版图之余。而人余于地,无以居之;地余于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务耕桑、无有定业而为流民,相沿数千年而不息。”^{〔16〕}文中所提到的赤白狄、淮夷、戎蛮陆浑、濮人、姜戎、群舒、岛夷,他们上与华夏族有共同的原始祖先,下与后世之兄弟民族有密切关联,根本不是什么“流民”、“山寇”,他们之所以生活于“溪山林谷,迁徙无恒”,固然与生活习性、生产条件有关,但华夏族的驱逐、追杀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华夷关系一直很紧张。祖国大好的“溪山林谷”限制了各类夷人族群的发展,也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延缓了语言华化的进程。我们今天还能利用活的语言资料研究史前即已形成的华夷语系,由溪山林谷形成的道道屏障,作用甚大。

现在的青甘云贵川湖广,“溪山林谷”之地,仍然分布着众多的兄弟民族。回溯新石器时代,他们中绝大多数的远祖曾参与中原地区、江淮平原、荆扬两州的开拓。苗族远祖蚩尤为炎帝族系,与黄帝族群有血缘关系,都属于原始华夏语系。蚩尤族群能争雄于冀州之野,可见是一个相当强势的集团,涿鹿一战大败于黄帝族群;其后裔九黎族企图东山再起,又大败于颛顼;九黎后裔三苗第三次复仇,最后败于舜禹之世。所谓“别三苗”,就是切割分流,有的“别”至西羌,有的流窜至南方,然后分别与当地土著结合。苗族的生性勇武强悍,不屈不挠,颇得蚩尤风。

如今的壮侗族群也是华夏语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族群的构成并非单一体,有少昊氏的仓吾等部族,也有祝融氏的后裔,还有夏禹的后裔,他们结合于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由东海之滨向南流徙,又与华夷语系之外的土著结合,形成了同中有别的多个语言分支。

国外某些研究史前中国语言的专家,大谈苗瑶、侗台与汉语只是接触关系,而非亲缘关系,缺乏起码的历史证据,只立足于片面的语音对比,完全昧于历史事实,结论当然不可信。

〔16〕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第365页,中华书局,1975年。

叁 证据之一:口传历史

所有来自原始社会的古老族群,几乎都有两种历史。一是口传历史,一是文字历史(无文字者当然不在其中)。

口传历史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只停留在口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一类是文字产生之后,将口耳相传之史写进书面文字,形成文字化的口传历史。本文用来证明华夷语系的口传历史就是指这种有书本为据的口传历史。这些书本包括《易》、《书》、《左》、《国》、《史记》、《山海经》、《世本》、《竹书纪年》、《水经注》等书中的口传部分史料,还有秦汉子书中来自远古的史料,以及与经书相表里又备受非议的纬书中的某些史前资料。

华夏族的文字历史,从甲骨文算起不过三千多年,而口传历史其下限以甲骨文之前为界,其上限即使从伏羲、女娲算起也在万年以上。所以口传历史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华夷语系研究中的重要性是任何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亲属语言比较研究可以确定同源关系但无法断代,考古文物可以断代却难以确定其族群属性。口传历史的时代、族属一般是明确的,危险在于真实性、科学性如何,价值究竟如何。近百年来对于这批资料有人提出了种种质疑,甚至于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原因就在于此。具体而言,一是材料本身矛盾重重,二是所谓的一元史观。诟病的焦点在大一统帝王世系。诟病基本上是从事实出发,问题不在事实,而在于今人如何用原始时代的视觉、思维方式、历史观念来正确理解、解读这些事实。

在漫长的口耳相传过程中,在口传历史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利害关系的人将其写成书面文字之前之后会脱离原样,这是正常的。欧阳修据此断言:司马迁、《大戴礼》、《世本》诸书之谱系“何其谬哉”!后人变本加厉,判定这些谱系全是虚构的,进而认为“旧日中国境内并无所谓夏朝”^{〔17〕},也不存在禹这样的人。“商、周言语并不同一”^{〔18〕},“周族确来自西北,他们所说的委实是拼音之语”^{〔19〕},各类肆意胡说应时而生。P·K·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言概论》中说:“可以认为周朝人可能操某种汉—藏语言,后来这种语言融合或渗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之中。”^{〔20〕}这类怪论很有教训意义。谱系虽有某些谬误,而一脚踢开谱系,根本置谱系于不顾,就不是一个“谬”字所能了结的,简直是数典忘祖了。

〔17〕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82页,中华书局,2004年。

〔18〕 同上。

〔19〕 岑仲勉《西周文史论丛·序言》,商务印书馆,1958年。

〔20〕 《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第18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7年。